

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

哈全安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

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

哈全安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 / 哈全安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01-03593-2

I . 阿… II . 哈… III . 阿拉伯国家 - 封建制度 - 研究 IV . K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32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字数: 144 千字 印数: 1-1,000

定价: 10.00 元

序

哈全安博士的新著《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即将问世。这是他承担的国家教委人文与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继1999年出版《古典伊斯兰世界》（齐世荣主编《精粹世界史》之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之后又一部新的研究成果。这两部堪称姊妹篇的著作是哈全安全面系统研究阿拉伯历史的阶段性成果。

哈全安在世界历史方面功底较深，尤其熟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封建历史，这对于研究阿拉伯史颇有助益。从这部著作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是用比较的眼光审视阿拉伯史的，能拨开各种错综复杂现象的迷雾，一进门就抓住问题的实质。他对阿拉伯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把握较好，什么是共性和个性，什么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在这部著作里都有清楚的说明。这部著作分设四章研究阿拉伯的封建形态，第一章是研究阿拉伯封建制的起源，第二章是研究阿拉伯封建政治形态，第三章是研究阿拉伯封建经济形态，第四章是研究阿拉伯封建社会结构。作者从上述四个方面考察阿拉伯封建社会，相应地得出了四点重要结论，值得注意。第一，阿拉伯封建制的起源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它没有经历奴隶制社会阶段，而是在原

始社会解体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阿拉伯人跨越奴隶制阶段之后，又接受了当时高度发达的拜占廷和伊朗文化的影响，因而阿拉伯封建文明起点较高，后来居上，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强国。第二，哈里发时代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形态是宗教与世俗的浑然一体。7—9世纪的世界上存在着四个大帝国：东亚有唐代中国，中亚和西亚北非为阿拉伯帝国，东欧是拜占廷帝国，西欧为查理曼帝国。四大帝国并存，以唐和阿拉伯为最强。就政治体制而言，四国各不相同：唐帝国是纯粹的世俗政权，儒、道、佛、景，可自由传教，不受限制；拜占廷政体是君权高于教权，只奉东正教为国教，不容许异教和异端传播；查理曼帝国虽政权掌握在君主之手，而教权则控制在罗马教廷手中，并认为教权高于俗权。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原则，皇帝和国王即位后必须接受教皇的加冕礼。阿拉伯的政治体制与上述东方华夏文明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迥异，实行教俗一体的政治制度是构成阿拉伯封建政治形态的突出特点。第三，哈里发时代阿拉伯国家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封建国家的土地所有制长期存在，并占支配地位。在封建制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土地的封建主私人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国有土地或者不存在，或者只占很小比重。阿拉伯的封建经济与东西方都不相同，封建的国有土地长期存在，并且制约着私人土地支配权的发展。最后，哈里发时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的特色在于长期保存奴隶制的残余。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就已出现奴隶制，而伊斯兰教产生后并未废除奴隶制度，《古兰经》承认奴隶存在的合法性。奴隶来源于异教徒战俘。被俘的阿拉伯人或者皈依伊斯兰教，或者处死，不得蓄为奴

隶。被征服地区不属于战俘的土著居民，或者改奉伊斯兰教，作为麦瓦利加入穆斯林行列，或者保留原来信仰，以迪米身份接受哈里发国家的统治。麦瓦利和迪米实际是处于阿拉伯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半自由人。麦瓦利、迪米、奴隶，构成阿拉伯封建社会结构的鲜明特色。

阿拉伯史，一般认为是世界各国历史中较为困难的部分。青年学子或由于语言障碍，或由于生活习俗的原因，将阿拉伯史的研究视为畏途，往往不敢轻易染指。因此我国阿拉伯史学者迄今仍凤毛麟角，老一辈学者有马坚、纳忠等各位先生，后继的中青年学者寥若晨星。哈全安博士自研究生时起就矢志研究阿拉伯史，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赴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德黑兰大学进修，从学习阿拉伯语做起，脚踏实地，一步步攀登阿拉伯史的学术顶峰，经过十几年乃至20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哈全安对阿拉伯史的钟爱极为执着，甚至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我相信天才出于勤奋，学问在于积累。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对于像哈全安这样青年同志的茁壮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很欣赏哈全安的治学道路，不是孤立地研究阿拉伯史，而是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知选择。历史研究应该促进文明沟通和文化交流，推动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有利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朱 窦

2000年1月25日于长春

目 录

第一章 阿拉伯人的兴起	(1)
一、阿拉伯人的古代历史	(1)
二、查希里叶时代	(12)
三、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社会形态的变革	(30)
四、阿拉伯人的征服	(61)
第二章 哈里发时代的政治形态	(69)
一、麦地那哈里发国家	(69)
二、倭马亚王朝	(82)
三、阿拔斯王朝	(89)
四、政治理论与政治运动	(109)
第三章 哈里发时代的经济形态	(145)
一、地权与赋税	(145)
二、地产与农民	(150)
三、农作区域与农业生产	(157)
四、手工业与商业	(167)
五、城市	(174)

第四章 哈里发时代的社会状况	(181)
一、阿拉伯人的迁徙与交往	(181)
二、倭马亚时代阿拉伯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 ——“阿萨比亚”现象	(188)
三、阿拉伯世界的异族穆斯林——麦瓦利	(198)
四、阿拔斯时代阿拉伯人的崭新面貌	(202)
五、哈里发国家的异教臣民——迪米	(204)
六、奴隶	(209)
主要参考书目	(214)
后记	(220)

第一章

阿拉伯人的兴起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consisting of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mall, stylized, symmetrical shapes resembling stylized 'S' or 'Z' marks.

一、阿拉伯人的古代历史

阿拉伯人最初的家园，是位于亚洲西南端的阿拉伯半岛。那里在远古时代曾经与非洲大陆和伊朗高原连为一体，后来由于地壳发生剧烈变化，约自侏罗纪时期（距今1.9—1.36亿年）开始，逐渐形成三面环海的半岛。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海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交往通道。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浩瀚无际的大海往往构成令人难以逾越的障碍。阿拉伯半岛缺乏适于停泊船只的天然港湾，相邻的岛屿寥寥无几，加之各种暗礁密布于周围水域，海上航行颇难，交通闭塞。因此，阿拉伯人常将自己的故乡称作“阿拉伯人的岛屿”。

在半岛内部,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甚大。赛拉特山位于半岛西部,绵亘 1800 公里;赛拉特山西侧至红海之间,是一

一条起伏不平的狭长地带，名为帖哈麦，赛拉特山与帖哈麦合称“希贾兹”（旧译“汉志”）。希贾兹的地表大都是干燥的荒原，稀疏的地下水源周围零星点缀着若干绿洲，麦加、叶斯里卜和塔伊夫皆是希贾兹的著名去处。希贾兹以南的也门，由于受到印度洋季风的影响，雨量较为充沛，气候相对潮湿；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作家常将该地称作“幸福的阿拉伯”。自也门向东直至阿曼，高大的山脉沿海岸线逶迤 1600 公里。赛拉特山和南部群山构筑起天然的屏障，阻挡着潮湿海风的吹拂，形成半岛内陆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纳季德高原（旧译内志）位于半岛内陆的中央地带，黑色的熔岩地表一望无垠。纳季德以南名为鲁卜哈利，土质坚硬，红沙遍野；纳季德以北是努夫德沙漠，沙质细柔，随风向变幻不定，形成红白相间的流动沙丘。纳季德高原、鲁卜哈利和努夫德沙漠的季节变化极为明显，每逢冬春时节，大雨滂沱，绿草如茵的牧场随处可见；雨季过后，草木枯萎，浩瀚的旷野遂为人性罕至的不毛之地。半岛缺乏常年通航的河流，却有称作“瓦迪”的季节性河谷遍布各地，可供商旅之用。南部的瓦迪哈达拉毛、瓦迪达瓦希尔和北部的瓦迪鲁麦、瓦迪希尔罕，皆是沟通半岛内陆各个区域和通往外部诸地的重要通道。

由于气候燥热，地表干枯，阿拉伯半岛植被稀少，资源匮乏。半岛的绝大多数地区属于贝都因人（阿拉伯语中意为“游牧者”）的世界，游牧的生活方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骆驼和羊群构成贝都因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财富。骆驼大约自公元前 1200 年出现于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至迟在公元前 9 世纪已经成为骆驼的主人。骆驼适于骑乘载货，其长途奔行的速度

和荷载能力远非其它牲畜可比。贝都因人更以骆驼作为最重要的生计来源,食其肉,饮其乳,衣其皮毛,将骆驼视作不可或缺的忠实伙伴。骆驼的出现扩展了贝都因人的生存空间,骆驼的牧养为贝都因人进入沙漠深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沙漠之舟”使贝都因人得以真正成为驾驭阿拉伯旷野的主人。分布在半岛东北部的巴克尔部落、纳季德高原的泰伊部落、塔米姆部落、阿萨德部落以及希贾兹的穆宰纳部落、吉法尔部落,皆是牧养骆驼的著名群体。牧养羊群是贝都因人的另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与骆驼相比,羊群移动速度缓慢,而且无法远离水源。羊群的牧养制约着贝都因人的活动范围,牧养羊群的贝都因人难以进入沙漠深处,大都分布在沙漠的边缘和绿洲的周围。贝都因人无疑处于居无定所的迁徙状态,但是却非毫无目标的随意游荡。他们大都拥有属于各自部落的水源和相对稳定的游牧范围,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追逐水草。雨季与旱季的明显更替导致贝都因人生存空间的周期性改变,进而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家园形成既期待离别又企盼返回的矛盾心理。

然而,阿拉伯半岛的生活方式并不局限于居无定所的游牧活动,牧群亦非阿拉伯人生计资料的惟一来源。许多地区由于较为充沛的降雨和相对潮湿的气候环境,具有发展农业的适宜条件。也门是整个半岛中最重要的农作区域,生长谷物和各种蔬菜、水果。也门以东的麦赫拉是乳香树的著名产地,水稻则是阿曼的重要作物。在半岛内陆,绿洲构成农作区域的另一种类型,地下水源是绿洲农业赖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叶斯里卜、塔伊夫、泰玛、法达克、海巴尔、杜麦特·詹达勒和瓦

迪库拉是分布在希贾兹一带的主要绿洲，半岛东部的叶麻麦和卡提夫亦有若干面积较大的绿洲，甚至鲁卜哈利沙漠深处亦不乏绿洲的存在。枣椰树自美索不达米亚传入阿拉伯半岛，是绿洲农业的主要作物。有些绿洲种植谷物，塔伊夫则因盛产葡萄而闻名遐迩。与也门一带相比，半岛内陆的绿洲农业耕作条件较为简陋；气候的干旱和水源的匮乏制约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人口的增长，定居的生活方式尚不稳定，牲畜的牧养往往构成绿洲农业的重要补充。

在广袤的阿拉伯半岛，游牧与定居两种生活方式虽然差异甚大，却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依赖和制约的状态。定居者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和生产水平的低下，往往需要游牧经济的诸多产品作为补充。贝都因人更加缺乏经济自给的能力，需要定居者提供各种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因此，定居者与贝都因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往的客观需要。在野蛮的社会条件下，抢劫构成定居者与贝都因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形式。“抢劫本是盗贼行径，但沙漠生活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却把抢劫提升到民族风俗的地位。”^① 绿洲由于人口稀少，分布散落，往往成为贝都因人抢劫的主要目标；定居者的各种产品通过一系列的抢劫而落入游牧群体的手中。定居者内部和游牧群体之间的相互抢劫也时有发生。希吉拉初期，麦地那穆斯林屡屡袭击麦加商队，体现了古代阿拉伯人传统的抢劫习俗在伊斯兰时代的延续。定居者与贝都因人相互交往的另一种方式，是提供保护和征纳贡品；这种交往大都发生于较为

^① 希提,P,《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

强大的游牧群体与地寡人稀的绿洲之间。贝都因人往往以提供保护作为条件,向绿洲的定居者征纳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贝都因人与商队的合作亦屡见不鲜;分布在商路沿途的贝都因人向过往的商队提供骆驼和向导,保护商队的旅行安全,商队则向贝都因人交付一定数量的财物作为报酬。伊斯兰教诞生前夕,纳季德高原东侧的贝都因人塔米姆部落与麦加的古莱西部落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合作^①。在茫茫的荒漠之中,商旅驼队离开贝都因人的合作几乎寸步难行,而两者之间的合作对于阿拉伯半岛的经济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阿拉伯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集市贸易占有显著的地位。阿拉伯人素有朝拜圣地的习俗;人们在举行祭祀活动之余,往往相互交换各种物品,宗教圣地遂成为定期集市的所在。阿拔斯时代的历史家赫姆达尼(?——945)曾经提到公元6世纪阿拉伯半岛的10余处集市,其中欧卡兹集市最负盛名。欧卡兹位于麦加以东100公里的山谷,西南距塔伊夫30余公里,每年11月举行集市,为期20天,来自半岛各地的阿拉伯人在此交换各自的物品。

“阿拉伯”一词本意为沙漠,“阿拉伯人”则指生活在沙漠中的人。公元前853年的亚述铭文曾经提到“阿拉伯人金迪卜的一千峰骆驼”,这是迄今所知关于阿拉伯人的最早记载。历史上第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与“骆驼”一词同时出现,说明阿拉伯人与游牧生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继亚述铭文之后,古典作家上自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

^① Kister, M. J., Mecca and Tamim,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65.

下至罗马的普林尼(公元 23—79)亦屡屡提及阿拉伯人,泛指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区域的诸多群体。在半岛南部,关于阿拉伯人的文字记载首先出现在公元前前后也门一带的碑刻之中。这些碑刻中所提及的阿拉伯人,仅指追逐水草的贝都因人。在半岛北部,公元 4 世纪的那马拉墓志铭文中记述了“全阿拉伯人之王”伊姆鲁·凯斯的生平,而该人的权力似乎并未超出半岛北部和中部的游牧区域。从上述的零散记载可以看出,古代阿拉伯人并非统一的社会群体,其内部存在明显的差异。

古代阿拉伯半岛的传统谱系,将阿拉伯人区分为绝种的阿拉伯人和尚存的阿拉伯人。《古兰经》中提到的阿德人和赛莫德人,应属所谓绝种的阿拉伯人。相传阿德人和赛莫德人生活在也门与阿曼之间的沙丘地带,亦传阿德人和赛莫德人分布在半岛西部的希贾兹。据《古兰经》,安拉曾经先后使阿德人和赛莫德人成为其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并使他们富庶兴旺;阿德人和赛莫德人后来由于弃善从恶,伤风败俗,相继遭到安拉“严厉的惩罚”,直至全族灭绝。尚存的阿拉伯人,相传是努哈(诺亚)的后裔和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子孙,分为盖哈丹人和阿德南人两支。盖哈丹人亦称“道地的阿拉伯人”,分为克黑兰族和希米叶尔族,包括泰伊、哈姆丹、巴吉拉、阿萨德、阿兹德、肯德、库达亚诸部落,大都祖居半岛南部,所操语言近似于两河流域南部的阿卡德语和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语。阿德南人亦称“归化的阿拉伯人”,分为穆达尔族和拉比尔族,包括巴克尔、塔格里布、哈尼法、塔米姆、基纳奈诸部落,主要分布在希贾兹和纳季德一带,所操语言近似于希伯来语,

后来逐渐演化为《古兰经》的语言。古老的传说并非完全出自虚构，谱系的划分反映了阿拉伯半岛内部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具有一定历史真实性。盖哈丹人大都属于定居者，阿德南人则往往处于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定居地区与游牧群体之间的深刻对立，构成阿拉伯人划分谱系的客观基础。持续不断的迁徙浪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改变着阿拉伯人的分布范围，形成不同谱系的血缘群体错综相间的状态。然而，谱系的差异和由此产生的敌对倾向根深蒂固，直至伊斯兰时代初期仍依稀可见。

阿拉伯半岛尽管地理位置相对闭塞，但是并非与世隔绝。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泥版文书曾经将半岛东南部波斯湾沿岸诸地分别称作迪尔蒙、麦干、麦鲁赫，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人则将半岛西南部曼德海峡沿岸称作篷特。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阿拉伯人的历史进程，在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带和北部的沙漠边缘逐渐出现文明的雏型。

古代阿拉伯人的文明雏型首先出现于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带，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构成半岛南部的文明雏型赖以萌生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半岛南部出土了大量的古代碑铭，铭文的日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大体分为米奈体和赛伯邑体两种。根据古代碑铭，米奈人曾经在也门西北部的焦夫一带建立国家，定都盖尔诺；赛伯邑人的国家位于米奈国的南侧，最初都于绥尔瓦赫，后来迁都马里卜。马里卜水坝始建于赛伯邑国王苏姆胡阿来·雅努弗及其子亚萨尔·阿麦尔·拜

因当政时期,高15米,砖石结构,设有闸门,兼有蓄洪和灌溉功用,堪称古代阿拉伯人的杰作,其遗址至今尚存。《古兰经》第34章以赛伯邑作为章名,并曾提及赛伯邑人因背弃安拉的信仰而遭马里卜水坝所泄急流的淹没。米奈人和赛伯邑人不仅发展了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古代世界的杰出商人。半岛南部沿海以及邻近的索克特拉岛是著名的香料产地,盛产乳香和没药。乳香制成的焚香是祭祀神灵和朝廷庆典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没药则是制作香水及诸多药品的重要原料,在地中海世界皆有广泛的市场,而香料的贩运构成米奈人和赛伯邑人的重要贸易内容。最初,香料大都经陆路销往地中海东岸。贩运香料的商旅驼队自哈达拉毛的沙卜瓦出发,绕过鲁卜哈利沙漠,向东沿波斯湾西岸北行,前往乌布拉,或向西沿红海东岸北行,经希贾兹进入叙利亚。米奈人和赛伯邑人还利用印度洋季风的规律性变化,航行于半岛以南海域,贩运东非和波斯湾沿岸直至印度西部的各种物产。“他们或许还没有发现印度,但是已经将印度的物产展现给地中海世界。”^①自也门经希贾兹至叙利亚的商路,在此期间成为沟通印度洋沿岸与地中海世界的主要贸易通道。米奈人和赛伯邑人控制着途经希贾兹的商路南端,而他们在商路沿途建立的贸易据点,一直延伸到希贾兹北端的乌拉、塔布克和约旦的麦安。古典作家曾经记述了米奈人和赛伯邑人的贸易活动,将他们誉为“南海的腓尼基人”。

公元前2世纪,与米奈人和赛伯邑人具有亲缘关系的希

^① Holt, P. 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1970, V1A, P16.

米叶尔人成为也门的统治者。希米叶尔人承袭米奈人和赛伯邑人的语言文化和商业传统，定都佐法尔。雾木丹堡宫建于公元1世纪希米叶尔国王伊利·萨利哈当政期间，建筑材料采用花岗岩、斑岩和大理石，共20层，高约百米，直至伊斯兰教诞生时期依然醒目，代表了希米叶尔人的文化成就。然而，希米叶尔人统治时期，香料贩运的路线逐渐发生变化。托勒密王朝重新开通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古代运河，埃及商船穿越红海，进入也门附近水域，开始威胁途经希贾兹的陆上贸易通道。公元前24年，罗马将领阿利乌斯·加拉斯率军自埃及南下，沿红海东岸攻入阿拉伯半岛，兵抵也门北部的麻里阿巴时攻势受挫，希米叶尔人幸免于罗马征服的厄运。自公元1世纪起，罗马商人穿越红海，定期往返于埃及与印度洋水域，直接贩运东方货物。罗马商船日益排挤“沙漠之舟”，红海逐渐取代希贾兹而成为连结地中海与印度洋的主要商路。“罗马商船进入印度洋，给阿拉伯南部的繁荣敲响了丧钟。”^①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趋于衰微，萨珊王朝日渐强盛，两河流域遂成为沟通地中海与波斯湾及印度洋沿岸的主要贸易通道，红海商路亦日渐萧条。商路的转移给阿拉伯半岛南部传统的香料贸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也门一带的经济生活趋于衰落。马里卜水坝曾经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定居社会和古代文明雏型的象征，于450年和542年两次毁坏，皆得以重修，至570年彻底坍塌。马里卜水坝的坍塌，标志着阿拉伯半岛南部文明雏型的崩溃。此后，半岛南部的许多部落相继离开祖居的家

① 《阿拉伯通史》，第66页。